

■玉渊杂谭

让高考多闪耀些人性的光辉

文·句艳华

今年的夏天热得有点早,但高考还是很准时地来了。今明两天,全国939万考生将走进考场,迎接这场或许将改变自己人生命运的考试。而部分省市由于考试科目设置不同,考试还将延续到后天。教育部已经发出通知,要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招生考试机构提高管理服务水平,为考生提供更加人性化的考试服务,具体包括,创造良好的考场环境,为残疾人参加考试提供便利,做好交通及突发事件预案等等。

细想起来,“人性化”确实是近年来高考的一大亮点。很多地方在高考期间,为考生提供了颇具温情的服务措施,交警开车送晚点的考生去考场,公安部门

为丢了身份证的考生赶制证件,市政部门要求建筑工地夜间停工以保障考生休息,甚至民航部门都让飞机绕开考场上空以降低噪音等等,频频见诸报端。

当然,更大也更重要的“人性化”还体现在制度的变革,比如,1985年开始,陆续有省份取得自主命题的资格;1994年开始,考试科目更加多样化,3+X,3+1+X等术语逐渐为人们所熟悉;2001年,取消了报考资格中要求“未婚,年龄一般不超过25周岁”的规定,这几年,大叔大妈走进考场也不是什么稀罕事儿了。

再推开一点看,1977年,恢复全国统一高考,本身就是中国改革进程中最具“人性化”的制度变革之一。高考所考的主要是知识,高考制度对于社

会进步的最大意义,就在于一个人可以用自己拥有的知识,改变自己命运并奉献自己的价值于社会。而知识的获得,虽然也与先天智力禀赋、后天学习环境等密切相关,但主要还是要靠个人的勤奋学习。因此,在人们特别是一个社会的年轻人实现社会流动的过程中,与血统、门第、资产、权位等因素比较起来,以知识为主要内容的高考,仍然是一把相对公正的尺子。

高考制度的人性化,归根到底,还在于其公正性。当今的中国是一个复杂社会,由于区域发展不平衡、社会阶层分化、社会管理体制不科学等问题,使“人性”在不同阶层的人那里,具有了多样化有时

甚至是冲突的内涵,各种因“特长”或“竞赛”而获得的政策性加分,对于符合生活在城市、家庭富裕的考生而言,应该是符合“人性”的,但对于那些没有条件获取相关教育培训资源的考生来说,就未必那么“人性”;高考和户籍捆绑在一起,对于受教育地和户籍所在地一致的的考生而言,没什么不“人性”的,但对于从小跟随父母辗转于不同的打工地点的考生而言,就不那么“人性”了;更无论那些高考和大学招生过程中的卖试卷、走后门、打招呼、递条子等仅符合少数特权人物“人性”的违规行为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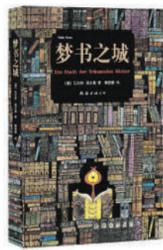
从这个意义上说,高考改革,依然在路上,前进的方向依然是“人性化”。

■乐享悦读

梦幻书旅

——读《梦书之城》

文·雅倩



(德)瓦尔特·莫尔斯著
赖雅倩译
南海出版公司出版

你是否也想象过,世界上会有这样一处:一座由书籍组成的城市,阅读和写作是城中人唯一也是最重要的日常生活,书店就像其他城市中的便利店一样随处可见,所有的经济发展都围绕着图书交易这个主题。也许,你会说这不正是保罗·柯林斯《六便士之家》中书镇的原型,英国威尔士的海伊小镇。虽然,海伊作为人口不到1500万,却拥有39家书店,10英里长的书架,100万册图书和50万人次的访问率,的确可以配得上“世界第一书镇”和“天下旧书之都”的美誉。不过,今天我们要探访的却是另一个只存在于幻想世界中的书之城。

在大西洋中有一块叫做查莫宁的古老而神秘的大陆,人类稀少,却有着许多古怪生灵。这里有一座神奇的书乡市。“这里拥有五千多家正式登记营业的旧书店,还估计有一千左右半合法的小书店,这些书店除了书籍之外,也贩卖酒精饮料、烟草,以及据说能提升阅读乐趣、有助于集中注意力的迷幻香草和萃取物。此外,还有多得数不清的流动书贩。”

但这里其实是一座充满危险的城市。“我”如果不是因为寻访年届七十七时尚未出版过任何作品,热衷描写蓝花椰菜的诗艺教父,死后所留给己一份神秘手稿的作者,也不会轻易踏足深入住有各色生灵的旧书乡,乃至它危机四伏的地下世界。

凶恶图书馆,正是这座城市中的一个邪恶之处。一名瘦人披着猩红色的丝绒斗篷,不断来回走动,露出令人毛骨悚然的獠牙,压低声音警告路人:“踏足者,后果自行负责。儿童与老人禁止入内!请考虑最严重的后果。这里有会咬人的书,有想取您性命的书!含有剧毒、会招人颈脖、会飞的,这一切都是来真的。这里不是鬼屋,而是实况演出!各位先生、各位女士,踏入凶恶图书馆之前,别忘了准备好您的遗嘱,向您的挚爱告别!”图书馆,竟也成了凶恶之处,“我”并没有踏足,所以,我们也无从领教其中的凶险有几分。

在书乡市,还有一群野蛮的“猎书徒”。很久以前,书乡市的人们发现地底潮湿干燥的气候条件非常适合纸张保存,所有国家藏书都被移置迷宫里,而世家贵族的文学宝藏、盗书匪的赃物、书商贩卖的首印书、出版社的出版品等,也都藏放在那里。而猎书徒正是一群自无法纪的亡命之徒,他们与旧书商或收藏家谈妥条件,为他们寻找珍奇异书。猎书徒只是毫不挑剔地找寻稀有、珍贵的书籍,他们的标准往往只是一种简单的推测,认为越是地底深处的书,应该更加古老也更为昂贵。

但在这座城市中,同样有着处处温情。“梦书”,这个诗意的名字,就是书乡市的居民给旧书取的。“因为从书商的角度来看,这些书籍既非真正活着,也不是真正死去,而是处在一种类似睡眠的过渡状态。它们曾有过的自我存在已成过去,而在前方等待的则是衰败,因此它们只好打起盹来,成百万成千万地滞留在书乡市的架子上、箱子里,在地下室、地下迷宫里。唯有当其中某一本被猎书者拿在手上翻阅、购买并带走时,它才能苏醒重生——而这也是所有猎书徒的梦想。”

诚然,旧书正是这样的存在。二手书籍的流转,也就变成了一种有温度的传递,让这些书籍带着上一个主人已经被封存的故事,来到下一个主人身边。让书再一次开始自己的生命旅程。

“炉柴时光”这个温暖的词语,同样是书乡市居民独创的。“指晚上那段悠闲的时光,是白日图业和文学生意结束后的惬意时段。当厚厚的柴块被扔进壁炉,烟斗点燃,当殷红如血的红酒在广腹杯里飘散着香气而朗诵家开始念诵作品时,炉柴时光就揭开序幕了。这时炉火里的木块会发出哔哔剥剥声,暖黄的光线笼罩着阅读室……炉柴时光是身体休憩,精神焕然苏醒,诗魂自纸页间升起,环绕着听众和读者舞动的时光。”

书乡市夜晚惬意的“炉柴时光”似乎也与我们的“围炉夜话”有几分相似。无论是梦书之城中的故事,还是现实生活中你我,可以有这样一起谈论书籍的美好时光总是值得珍惜的。

其实,从你翻开这一本《梦书之城》开始,故事的结局就已经变得不再重要,手稿的作者是谁也不再重要。唯一重要的是,你已经和书中的“我”一同踏上了这段神奇的梦幻旅程,在这座书之城,不用担心迷路,因为总有一本可以为你指引方向。

■桂下漫笔

文·胡一峰

“炮声”中的傅斯年

傅斯年是海归学者、大学教授,性情秉直,对看不惯的人或事,总是毫不留情地抨击甚至“爆粗”,因此又有“傅大炮”的雅号。要说傅斯年骂得最痛快的,要算汉奸、权贵和中医。

1945年8月,日本战败投降。傅斯年十分高兴,喝得大醉,游荡在重庆街头,亲吻遇见的每一个人。很快,他也当上了“接收大员”。不过和别的“接收大员”不一样,傅斯年去伪接收区接收的不是票子,也不是房子,而是他的母校北京大学。受命伊始,傅斯年就发表了一篇声明,痛斥北平沦陷时与日本人合作的知识分子,亮出“汉贼不两立”的立场,宣布“不聘请任何伪校伪组织之人任教”。伪北大文学院院长周作人曾是傅斯年的老师,当年傅斯年在北大办“新潮社”,得到过周作人很多帮助。但在民族大义面前,傅斯年没有对周作人网开一面。另一位在伪北大任职的教授曹康面见傅斯年为自己辩护,傅斯年却一拍桌子:“你这民族败类,无耻汉奸,快滚!不用见我!”

傅斯年不止骂过汉奸,还骂倒过蒋介石政府两任行政院长。1942年,行政院长孔祥熙乘政府发行“同盟胜利美金储蓄券”,大肆套取公款。傅斯年时任国民参议员,当仁不让地在国民参政会上开炮,质问:如不惩治孔祥熙之流贪腐之徒,“国法安在”?为了保住孔祥熙,蒋介石曾亲自出面向傅斯年疏通。蒋对傅说:“你既然信任我,那么,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。”傅斯年答道:“委员长我是信任的,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,那么,敲碎我的脑袋,我也不能这样说!”蒋介石只好免去了孔祥熙职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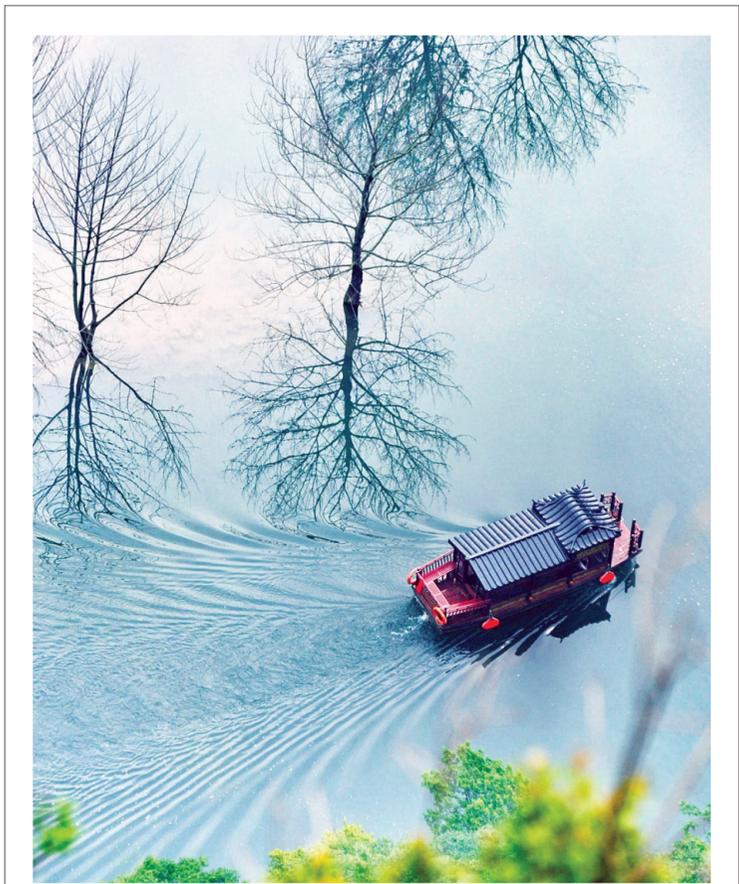
接替孔祥熙的宋子文上任后,换汤不换药,打着国家的招牌中饱私囊。傅斯年再一次被激怒了,他发表《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》(《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》),猛烈抨击宋子文。他说:“古人说‘化家为国’,现在是‘化国为家’。”“我真愤慨极了,一如当年我在参政会要与孔祥熙在法院见面一样,国家吃不消他(宋子文)了,人民吃不消他了,他真该走了,不走一切垮了。……我们要求他快走。”最后,宋子文也不得不下台。

除了骂汉奸、骂权贵,傅斯年还骂过中医。

1934年,傅斯年在《大公报》《独立评论》上发表了《所谓国医》(再论所谓国医)等系列评论,痛心疾首地说,“中国现在最可耻最可恨最可使人短气的事,不是匪患,不是外患,而是所谓西中医之争。……只有西中医之争,真把中国人的劣根性暴露得无所不至!”在近代中国,西医学论争不仅关系医学,而且演化为一场绵延日久的中西文化大讨论。梁启超、章太炎、胡适等大学者都曾卷入其中。但言辞如此激烈的,却只有傅斯年一人。他的激烈态度招来了中医拥趸的猛烈回击。中医粉丝们说傅斯年“颠颠武断,信口开河,不但失言,而且失态”,“除了脸上的黄色和五官百骸的外表,更是穿上洋服仍不能改变其为中国人外,其余的思想生活习惯,都已经全部与美国人同化了”,还给傅斯年扣上了一顶想把中国带入美国“殖民地”的大帽子。

其实,上纲上线的“诛心之论”冤枉了傅斯年。傅斯年骂中医,虽然措辞有值得商榷的地方,但他内心所关怀的却是中国医学乃至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,而这些,又关乎着国家前途。傅斯年是一个爱国者,但正如他自己说过的那样,“我拥护政府,但绝不拥护既得利益者,更不能容忍置国家利益于不顾,中饱私囊,把国家搞乱了的人”。在这位五四青年看来,爱国,并不意味着对国家过去的东西不能革新,也不意味着对国家现在的状况不能批评,更不意味着对那些戕害国家利益和前途的人不能指责。这一点,那些被傅斯年骂过的人心里其实清楚得很。1945年12月2日,也就是傅斯年痛斥汉奸的声明发表的那天,周作人在日记中写道:“见报载傅斯年谈话,又闻巷中驴鸣,正是恰好,因记人文末。”周作人知道义在傅斯年一边,虽然被学生骂后心有不甘,但也只能在日记里酸溜溜地吐吐槽。

“千夫之唯唯,不如一士之谔谔。”傅斯年在近代中国史上留下了隆隆炮声,最后也在炮声中离开了世界。1950年12月,傅斯年在台湾回答“参议员”郭国基的质询后,倒地昏迷,突发脑溢血去世。郭国基在当时有“郭大炮”之称。台大的学生们认为,傅大炮是被郭大炮气死的,打着“痛失良师”的旗帜,要讨还公道,经多方劝导方才平息。傅斯年遗体火化后,葬于台大校门右侧一空地,名为“傅园”。



摄影/在斌

听雨三章

李泳

观书听雨旧闻黄, 一夜青山碧水长。 琵琶声里梦苍楚, 天街初听似新芽。 好雨殷勤添墨趣, 九丝烟树一丛花。 一湖烟雨两峰青, 千里流云过画屏。 还是江南春梦好, 小艇听雨过西泠。

北魏的微笑

文·徐耀

与其说微笑的佛像是云冈石窟最耀眼的美学特点,不如说北魏的微笑透射着魏晋南北朝文化的时代特点。

云冈石窟最为色彩绚烂的第五窟到第十三窟,大量浅浮雕的佛本生和佛传题材描绘了极度的肉体痛苦:割肉饲鸽,舍身饲虎,须达努好善乐施,五百强盗成佛等等,衬托着佛像的庄严。这些故事是地道的反理性宗教迷狂,其艺术却激昂、狂热、紧张,与佛像宁静而微笑着的庄严主题形成对比强烈的渲染,将佛像衬托得更加至高无上,象征着世界的最高智慧。黑格尔论欧洲中世纪宗教艺术时说,把痛苦和对于痛苦的意识 and 感觉当做真正目的,在痛苦中愈加意识到所舍弃的东西的价值和自己对它们的喜爱,越长久不息地观看自己的这种舍弃,就越发感觉到把这种考验强加给自己身上的心灵的丰富。

魏晋南北朝的王朝更迭都起始于残酷的杀戮,处于社会上层的门阀大族政治斗争异常残酷,门阀士族的头面人物无可避免被卷入政治漩涡,名士们一批又一批被送上刑场,何晏、嵇康、张华、潘岳、郭璞、刘琨、谢灵运、范缜等等,至于涂炭的生灵则不可计数矣。门阀士族们既富贵又满怀忧患,民众朝不保夕,痛苦茫然,从上到下一致痛苦。于是南北朝的文化特点恰如微笑的佛陀和残酷的佛传故事,尽管外表洒脱不凡,内心却更加强烈地执着于人生,这种非常痛苦,构成了魏晋风度内在深刻的一面。

南朝梁武帝萧衍将佛教定为国教,倾国力建造大量寺院,并数次将自己施舍到寺院,真可谓虔诚,却在侯景之乱中被活活饿死。北朝有所不同,沿袭自草原游牧习惯的皇室风俗,使得皇室常常发生皇帝母子间的残杀,可以想见北朝的皇帝们也内心痛苦。于是佛陀成了全中国的信仰,那微笑中隐藏着难以言说的挣扎。在这普天之下缺乏安全、正义的南北朝,诞生了魏晋文学的两大代表人物,陶渊明和阮籍,分别创造了两种不同的文学境界。魏晋南北朝时期,最重要的艺术成就在于文学中诗歌的独立

■文心走笔



南北朝的文化特点恰如微笑的佛陀和残酷的佛传故事,尽管外表洒脱不凡,内心却更加强烈地执着于人生,这种非常痛苦,构成了魏晋风度内在深刻的一面。
图为云冈石窟的标志——第二十窟露天大佛。

谨以此文献给现实中焦虑不安的中国人。

于杀戮中崛起,在微笑中隐没。这是北魏,来自大兴安岭的鲜卑人建立的政权和创造的文化。150年历史不长,但北魏对中华文化,尤其北方文化的影响却十分深远。北魏在其一百多年的相对稳定统治里,留下了微笑的信仰,以云冈石窟为其文化标志。石窟里的佛像,无论早期的健陀罗风格、中期的凉州风格,还是后期的南朝风格,佛像大多面带微笑,或喜悦,或淡然。在那个动荡不安、政治黑暗、民生苦难的时代,佛陀的微笑就是社会民众的希望。

曾经去过几次云冈石窟,对其艺术美的感受逐渐加深。今年五一一节中午陪人匆匆赶到石窟,在偏西的阳光下,瞻仰到了佛陀的微笑。第二十窟露天大佛是云冈石窟的标志,三点钟的太阳把光芒抛向大佛,高挺的鼻梁和微微上翘的嘴角之间,一点点阴影使微笑更富有感染力。从正面观看大佛,看到的是宁静,换个角度就有不同感受。我本来在朝着第二十窟的西边前进,不经意间回

头,一瞥之下,石窟活了起来,“北魏的微笑”直达意念,佛陀在笑什么?为什么只有云冈石窟的佛像面带微笑?是拓跋皇家对天下太平的满意,抑或在教义熏陶下人们超越了时代的痛苦?

宗教是异常复杂的社会现象。宗教艺术首先是特定时代和阶级的宗教宣传品,承载着信仰和崇拜,不只是单纯观赏的对象。当宗教被大众接受之后,大众的理念也会通过艺术家的手掺杂到宗教艺术中来。北魏统一中国北方后,俘获很多西域僧人和雕刻艺人,画匠,历史所谓凉州系高僧带来西域风格的石窟建造方法,后来不断融合汉族建筑特点和壁画技法,形成中西合璧的独特艺术,是世所公认的艺术瑰宝。北魏后期,来自南朝的徐州系高僧得到北魏皇室的信任,于是云冈石窟造像由身材丰硕、表情威严、目光和藹、气度恢弘的西域-拓跋风格转变为清瘦、谦恭的面貌,最终由“秀骨清相”的北齐造像为这个时代画上句号,而秀骨清相就已经完全是汉族门阀士族的审美观了。至于后世的佛像,唐朝造像柔弱(女性化)、夸张,再后世的造像无精打采,掩盖不住佛教的衰落。后代的佛陀再也没有微笑。